

Ubuntu & Fratelli Tutti： 社會工作價值的反思

張英陣

壹、另類社會工作價值

*Ubuntu*是2021年世界社工日的主題，這個主題讓我對兩件事感到驚訝。從2007年以來世界社工日的主題基本上都是反映全球社工界的主要價值理念及社會工作實踐的方向。長期以來西方白人世界主導了全球的社會工作價值，從過去世界社工日的主題所呈現的社會發展、人權、社會與經濟平等、人性尊嚴及永續發展等，基本上是反映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傳統。2021年會以非洲重要的哲學理念作為世界社工日的主題是第一個令我驚訝的事。或許這也沒有甚麼好大驚小怪的，如果仔細追溯過去這幾年的全球社會工作發展，這個脈絡還是有跡可循。

2018年是全球社會工作價值的轉捩點，傳統以西方白人所主導的社會工作價值開始融入了世界各地的多元價值。2018年的〈全球社會工作倫理原則〉（*The*

Global Social Work Statement of Ethical Principles, GSWSEP）經過世界各國社會工作界的討論，擺脫了過去以自由主義主導的價值理念，融入了亞洲、阿拉伯、非洲及南美洲的社會價值。2018年的倫理原則某種程度是各國文化價值彼此的妥協，像是南美洲的代表強力主張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參與社會運動以及成為政治的行動者是社會工作倫理的必然要求，但是這樣的基進觀點仍舊很難被歐洲及美洲的代表所接受（Sewpaul & Henrickson, 2019）。儘管如此，2018年的倫理原則至少是各國代表願意以謙虛的態度接納不同文化之價值，2021年的世界社工日以*Ubuntu*為主題算是具體的展現。

第二件讓我感到驚訝的事，是我感覺臺灣的社會工作界似乎對世界社工日的主題沒有甚麼反應。我們鄰近的香港、澳門與大陸至少都有發布世界社工日的訊息，公告華文版*Ubuntu*（仁愛）的海報，甚至

為此議題召開研討會。我們主管社會工作的政府單位及社會工作專業組織似乎對世界社工日的主題不感興趣，我曾在一些社工實務的場合詢問社工員關於世界社工日的主題，沒有任何人了解*Ubuntu*的意義。我一直納悶全球社工界所關心的議題，難道與我們在地的社會工作實務毫無關聯嗎？還是我與臺灣的社工圈已經相當疏離，也許社工界已熱烈討論過*Ubuntu*的主題，只是我無知而已。

Fratelli Tutti《眾位弟兄》是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於2020年10月3日所發表的一道通諭（encyclical）。天主教教宗所發表的通諭大都是對時代的社會議題提出深刻的反省與批判，並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從1740年到現任教宗的通諭，一直都是西方探討社會議題的重要文獻，其中不乏與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密切相關的通諭，像是1891年的《新事》通諭（*Rerum Novarum*），及《新事》通諭發表之後的《四十年》通諭（1931）、《慈母與導師》通諭（1961）、《工作》通諭（1981）、《社會事務關懷》通諭（1987）、《百年》通諭（1991）等。現任教宗方濟各的《福音的喜樂》勸諭（2013）、《願祢受讚頌》通諭（2015）及《眾位弟兄》通諭（2020）所關心的問題也都與社會工作息息相關。

我之所以將*Ubuntu & Fratelli Tutti*放在一起討論，是因為這兩個概念都觸及到最

根本的人性論（*human nature*）議題，以及人類社會如何追求繁榮昌盛的美好社會（*eudaimonia*），而且這些理念有別於立基於自由主義之社會工作價值，值得社會工作者有另類的省思。本文將先討論*Ubuntu & Fratelli Tutti*的核心理念，再討論脆弱性和相互依賴等社會工作的重要價值。

貳、*Ubuntu & Fratelli Tutti*

*Ubuntu*是非洲社會長久以來口耳相傳的文化價值，到了1846年才開始有文字書寫的紀錄（Gade, 2011）。*Ubuntu*是祖魯族語（Zulu），但在非洲的各個地區或國家雖然用語不同卻都有類似的概念。這個非洲傳統悠久的價值因殖民的影響遭受破壞，不過1950年以後，此一傳統價值再度被重視。其中曼德拉（Nelson R. Mandela）和圖圖大主教（Desmond M. Tutu）在南非的人權運動中倡導此一理念有很大的影響。就如同圖圖大主教所言，*Ubuntu*很難轉譯成西方的語言。事實上，也很難翻譯成中文，港澳地區有人譯成「仁愛」算是很勉強。因為*Ubuntu*不是一個詞，而是許多概念的融合。誠如圖圖大主教對*Ubuntu*的詮釋：

*Ubuntu*涉及人性的本質。當我們想高度稱讚某些人時會說“*Yu, u nobuntu*”，意思是他們具有*Ubuntu*。也就是說他們是慷慨的、好客的、友善的、關懷的和慈悲

的。他們願意分享所擁有的。*Ubuntu*同時也是指涉個人的存在與他人的連結。我們經常說「人是因為有他人才成為人」。我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屬於群體，我在群體中參與和分享（Tutu, 1999）。

*Ubuntu*在非洲恩古尼語（Nguni）裡就是人性（humanity）的意思。也就是說一個真正的人是屬於社會的一部分，是關係的、共融的、社會的、環境的、靈性的世界之一部分（Kurevakwesu & Maushe, 2020）。*Ubuntu*的人性論有別於西方自由主義強調理性自主的個體，而是強調人的本質是關係。笛卡爾（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代表了西方自由主義的人性本質觀點；對非洲的*Ubuntu*而言，「因為有我們才有我；所以有我們，故我存在」（I am because we are; and since we are, therefore I am）（Mbiti, 1969）。

Gade（2012）的實證研究呼應了圖圖大主教對*Ubuntu*的詮釋，Gade發現*Ubuntu*有兩種意義，一是指人所具有的道德特質，尤其是慷慨、同理、寬恕和細心體貼等；有時候*Ubuntu*是指神性的呈現，促使人為善且遠離惡行。第二種意義是一種世界觀或哲學觀，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相互連結的模式。簡言之，*Ubuntu*是指社群中人與人之間所展現的人性，其強調的人際關係與社會工作所強調的人在環境中之專業特質類似。只是西方的人在環境中的概念仍以個體為中心，*Ubuntu*的人在環境中則

是以關係為核心。事實上，*Ubuntu*的價值與理念和社會工作所重視慈悲、關懷、慷慨、好客、團結、分享、同理、同情心和人性尊嚴的價值是一致的（Mupedziswa, Rankopo, & Mwansa, 2019）。

對人的稱呼通常代表著我們與對方的關係，當我們稱呼「眾位弟兄姊妹」時，那是我們希望和鄰近的及遙遠的人建立親密的友誼。Swanson（2007）認為*Ubuntu*是非洲人本主義的哲學，藉由兄弟或姊妹的情誼（brotherhood or sisterhood）將個人與群體連結。教宗方濟各的《*Fratelli Tutti*》通諭是取自亞西西聖方濟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的《勸誡》，教宗方濟各在通諭的前言裡開宗明義地指出和*Ubuntu*理念一樣的人性本質：

在他【亞西西聖方濟各】的眾多勸言中，我要特別指出他怎樣敦促我們活出超越地域和空間阻隔的愛。他亦宣告，「不論他人遠在天邊，還是近在眼前，也同樣愛他們」的人，是有福的。他以此寥寥數語，講解一種敞開胸懷的兄弟（姊妹）情誼，道出其真諦。這種兄弟（姊妹）情誼使我們得以肯定、欣賞和愛每一個人，超越物理的距離和地域的局限，也不論對方的出身或背景（教宗方濟各，2020；Papa Francis, 2020）。

教宗方濟各在《*Fratelli Tutti*》這道社會通諭中，特別重視兄弟姊妹的情誼與人際之間的友誼。從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中，教宗方濟各強調這是全世界的悲劇，更提醒世人：「我們是一個全球性的團體，……誰也不能獨自得救，我們只能一起得救。……我們因而再次發現大家彼此相屬，而且無法逃避這種關係——彼此為弟兄姊妹的關係」（Papa Francis, 2020）。他批判許多人以各種方式建立「圍牆文化」（culture of walls），讓人與人之間缺乏交流的機會。個人主義、追求私利的經濟制度、濫用網路科技及戰爭，不斷地摧毀人類的手足情誼。雖然全球化使人變得更接近，「但是卻沒有使我們成為兄弟姊妹」（Papa Francis, 2020）。

《*Fratelli Tutti*》一樣主張人性的本質是關係，人際的關係不僅限於親密的微觀關係（microrelationships），更應擴及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宏觀關係（macrorelationships）。人際的關係應該是兄弟姊妹的關係，這層關係藉由愛來連結。「愛」不是名詞，而是個動詞，我們需要以情感付諸行動，成就他人。當我們愛他人，就能欣賞他人的價值，就會積極創造他人最美好的生活。唯有透過培養愛的關係，我們才不會排斥任何人的友誼，讓所有人都能擁有兄弟姊妹的情誼。當我們有社會愛德（social love），我們願意和不同的族群對話，以謙卑的態度接納窮人、新住民、移工，並尋求社會正義；當我們有經濟愛德（economic love），我們的生產制度就會像馬克思所主張的，經濟

制度應該是「共融的關係」（communal relationships），人應該拋棄私利的動機、社會冷漠及工具性的態度，人性化的生產模式是為了滿足他人的需求而生產（Kuch, 2016）。教宗方濟各提到，我們經常要被迫擁戴新自由主義的信念，但是「市場不能自行解決所有問題」。所以，我們需要的經濟制度是一種以關係取向並滿足人民需求為導向的關懷的經濟（caring economy）或友善的經濟（cordial economy）；當我們有政治愛德（political love），我們不會將政治視為是權力的爭鬥，也不會將政治降格為選戰的輸贏。Nussbaum（2013）認為「愛」是對人性的尊重，它不是個政治口號，而應以實際行動建立「關懷圈」（circle of concern）。在這個不完美的現實社會中，如果要追求正義，最迫切需要的是政治愛德。教宗方濟各再次邀請大家重新認清政治「仍是一種崇高的召叫和愛德的最高表現之一，只要它以尋求公益為主」（Papa Francis, 2020）。

*Ubuntu & Fratelli Tutti*所關切的議題非常廣泛，像是和平、衝突、戰爭、多元文化、移動人口、勞動、經濟制度、政治治理及社會關係等，也和社會工作實務與社會福利政策息息相關。作者沒有能力討論如此龐雜的議題，僅針對*Ubuntu & Fratelli Tutti*的核心理念與社會工作相關的價值加以論述。

參、脆弱性

人性論是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以社會工作而言，我們對人的假設直接影響到對人與問題的看法，以及社工處遇的解決策略。當前主流的人性論是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的觀點，社會工作強調案主自決、自主性、個人與家庭責任、自立生活、個人化服務（*personalization*）、批評福利依賴等基本上都是受到經濟人的人性論之影響。經濟人的觀點主張人是理性的、個別化的、功利的、精打細算的。所以，每個人都要能做到自我主宰（*self-mastery*）（Tronto, 2017），案主應該要為自己所遭遇的問題負起責任，並自行尋求解決方法以降低生活的風險；若無法自我主宰，則會被批評為道德上的瑕疵。

經濟人的人性論掌握的似乎是人在黃金歲月的樣貌，可是這種接近超人的詮釋只是生命歷程中的一小部分。不容否認的是人性具有理性的本質，但我們不能偏執於單一面向，因為人的本質是多元的。人性具有社會性與動物性，而且這兩者相互影響，傳統自由主義的經濟人之人性論忽略了動物性的一面。任何人的肉身軀體無法擺脫動物性，然而動物性並非全然理性自我操控的，人類的動物性反而更凸顯出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本質。可是長期以來，道德哲學與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都忽略了人的脆弱性本質。道

德哲學和社會科學之所以忽視脆弱性的議題可能有三種原因：一是主流的個人主義認為良好的生活應該是自給自足和自主性，脆弱本身及因為脆弱造成對他人的依賴是個人主義所不稱許的；其次是道德哲學著重於理性與知性的探討，脆弱性是屬於身體的特質因而被忽視；第三是脆弱性實質涉及個人和他者之間情緒的問題，然而情緒在道德哲學中也是被邊緣化的議題（Hoffmaster, 2006; Roger, 2014）。以經濟人觀點為基礎的個人主義甚至以負面的觀點看待脆弱性，例如衛生福利部的社會安全網計畫的「脆弱家庭」，多數的社工員是以負面的「脆弱因子」來看待這些家庭。若回歸人性論的觀點，則需要重新理解脆弱性。這些議題包含何謂脆弱性？誰應該對脆弱性負責？

*Ubuntu*的理念之所以特殊在於即使是擁有特權的人，在人生的某些時刻也是脆弱的，所以需要親屬、鄰里和社區成員的支持（Mupedziswa et al., 2019）；在《*Fratelli Tutti*》裡，教宗方濟各以新冠病毒為例，說明了人類普遍存在的脆弱性；2018年的全球社會工作倫理原則在國際社會工作倫理議題上首度揭示人類的脆弱性：

我們體認到基本的概念需要從自主性脈絡中的人性尊嚴，轉變成人性尊嚴與人權的相互主體性及相互關係性。人不再是自由主義理論所建構的自主與獨立的人，

而是鑲嵌在社會中，依賴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結構與傳統。脆弱性是人類生存條件普遍存在的一部分（IASSW & IFSW, 2018）。

西方學術界基本上從兩個面向來定義脆弱性，一是脆弱的動物性，這是普遍存在於所有的人類，亦即每個人都不免生、老、病、死，可能遭受身體上的傷害和痛苦。在生命歷程中，嬰幼兒、老年、疾病、失能等身體的脆弱性更高。就人類的動物性而言，我們每個人都是脆弱的，所有的家庭都是脆弱家庭，只是每個人或家庭在不同情境的脆弱程度不一而已。其次，脆弱不僅是動物性，也具有社會關係性的本質。亦即某些人之所以比較脆弱是因為權力、能力或需求的不平等，使得這些人容易受到他人的傷害或剝削。也就是說脆弱性是關係（relational）取向的，脆弱可能是遭受他人的傷害，但同時也需要依賴他人的照顧。如果我們將某些人或族群標籤為脆弱的，很容易導致讓這些人遭受歧視、刻板印象和父權式的對待。法學家Fineman（2008）也批評「脆弱人口」（vulnerable populations）的概念容易讓脆弱性和受害、剝削、依賴或病態連結在一起。人類作為一種特殊的動物，人和人都很難有完全的自主性，只能有關係的自主性（relational autonomy），任何人都需要依賴與他人的社會關係才能繁榮興盛（Mackenzie, Rogers, & Dodds, 2014）。

當代的德行倫理學家MacIntyre（1999）主張人是一種依賴的理性動物（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因為人類的天生條件就是脆弱，但卻有理性去承擔脆弱的責任，而且也體認到人與人相互依賴的必要性，需要具備關懷照顧他人的德行。因此，從人類兼具社會性與動物性的本質來看，脆弱性可以分為天生的（inherent）、情境的（situational）與病理的（pathogenic）脆弱性（Mackenzie et al., 2014），這三種類型區分難以周延互斥，而是相互交織的關係。天生的脆弱性是指人的脆弱來自於人類的內在條件，血肉之軀必有饑渴、睡眠、身體受傷、情緒不穩、社會孤立的脆弱。有些脆弱性是片刻的，有些則是長期的脆弱；天生的脆弱性程度會受到年齡、性別、健康狀況及失能程度的影響。情境的脆弱性是指特殊脈絡情境下的脆弱，主要是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脈絡情境所引發（Mackenzie, 2014; Mackenzie et al., 2014）。例如COVID-19、旱災、震災等天然災害造成人的脆弱；當然也有人謀不臧、政策錯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造成多數人的脆弱，例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首要目標所關切的絕對貧窮與貧富懸殊問題主要導因於人為的脆弱。病理的脆弱性是屬於情境的脆弱性之特別類型，這是一種道德上無法接受而且尚未消除的脆弱性，這種脆弱可能來自人際關係之間的偏

見或濫用權力，例如長期臥病在床的老人遭受到照顧者的精神或語言的虐待；也可能來自制度性的宰制、壓迫或政治暴力，例如經濟發展和福利私有化政策造成貧富懸殊擴大，讓更多弱勢族群限於脆弱；又如疫情期間的各種管制措施是為了降低所有人被感染的風險，但亦有可能管制不當而侵犯人權，或防疫措施失當造成更多人被感染。

肆、相互依賴

我們經常講「人生無常」，這就說明了脆弱的普及性。然而脆弱性畢竟對人類造成痛苦或傷害，在生命歷程中我們不斷地試圖降低脆弱性的傷害，但誰應該承擔脆弱性的責任呢？這也是脆弱性的倫理議題。簡單的說，既然脆弱性存在於所有人的身上，而且脆弱性又具有關係性，那麼保護因為脆弱性所造成的傷害就是社會大眾的共同責任。

自從1990年以後，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西方國家的管理、社會政策、衛生福利等領域逐漸形成「責任化」（responsibilisation）的概念。「責任化」的人性論是立基於人的自主性與自由選擇，強調的是自我管理。所以福利服務的案主與家庭應該自行承擔自己的責任，而不是依賴國家福利制度的協助。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的「大社會」（Big Society），

意即個人和在地社區（例如福利社區化）應該承擔福利、健康、安全的責任，不要讓福利國家由上而下解決問題。這種保守主義的理念強調由公民社會和私人企業取代強而有力的國家，讓弱勢族群承擔更大的脆弱風險（Juliha, Raitakari, & Löfstrand, 2017）。

「責任化」的概念雖然強調責任，但卻是沿襲自由主義的傳統，著重的是個人的責任。當我們肯定人性本質具有脆弱性，一旦處於脆弱的情境，人就產生依賴（dependency），更確切的說應該是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所以，脆弱性、相互依賴與責任的相互交織，才是人類生存之道。而面對脆弱性所需要的責任則是一種是集體的責任。Fineman（2008）主張脆弱性應該是國家治理的政治與法律之核心議題，由於脆弱的普及性則更需要一個積極、有回應能力的政府。縱使政府無法讓人民免於脆弱性，但可以提供資源促進人民的復原力。Fineman（2008）主張有回應性的政府不是威權式的治理，而是具有彈性回應人民需求的政府結構和充權脆弱人民的能力。而且要確保社會各階層資源和權力的公平分配，促進人民的公共參與，讓社會的民主深化。

更具體的說，當脆弱性與相互依賴是人性本質，人類的社會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賴關係，Kittay（2015）稱之為鳥巢式互相套合的依賴（nested dependencies），

那麼人類彼此之間的責任應該就是關懷或照顧（care）。由於這層相互依賴的關係，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應善盡責任協助有需求的人；但是當我們有需求的時候，也確保他人會提供我們適時的支持。因為，任何人若缺乏他人的照顧都無法生存。雖然照顧對人的生命如此重要，可能是因為它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太過平常，反而在社會中被忽視。事實上，從事照顧工作的人理應是社會最重要的人，但在自由主義的資本市場邏輯中，照顧者往往被回報以低薪及低社經地位。Fineman（2008）的回應性政府主張資源與權力公平分配，Tronto（1993）更進一步指出照顧責任更需要公平分擔，因為她認為當今社會中照顧責任的分擔相當不公平。那些沒有特權的人，像是弱勢婦女、弱勢族群、移民、移工等承擔了社會中絕大多數的實際照顧責任，而高社經地位與高收入的特權階級很少實際承擔照顧的工作，甚至花錢雇用人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Tronto稱之為「有特權的不負責任」（privileged irresponsibility），這種現象也呈現出社會的不公平與不民主。

對已開發國家而言，就如同伊斯特林矛盾定律（Easterlin Paradox）所指出的，經濟發展及所得提升不一定能帶來人民的幸福。許多經濟學家和公共衛生學家也確認，已開發國家的GDP成長對國民福祉的增進沒有太大的效益（Piketty,

2014; Wilkinson & Pickett, 2009）。許多先進國家的領導者在談論國家的發展時仍偏重於經濟發展，而忽略了從1990年代以後，多數先進國家已經面臨嚴重的「照顧赤字」（care deficit）與「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問題。所謂照顧赤字是指先進國家缺乏照顧有需求的兒童、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之工作人力；民主赤字則是當今的許多政府機構無法反映人民的價值與理念，在決策過程中缺乏人民的參與。但是多數的政治領導者仍舊偏重於經濟赤字的問題，卻相對忽略照顧赤字與民主赤字的急迫性。因為脆弱性的存在，人與人之間需要相互照顧，民主政治更需要關注照顧責任的問題。關懷照顧不應是自由主義所主張的私領域問題，而是公共領域的政治核心議題，也是關懷民主（caring democracy）的議題（Tronto, 2013; Urban & Ward, 2020）。

*Ubuntu*的本質就是關係性（relationality）與照顧義務，如果他者受到傷害，我們自己和他者都無法展現人性，是因為人的相互主體性才讓我們成為真正的人（Gouws, & van Zyl, 2015）。教宗方濟各在《*Fratelli Tutti*》裡亦強調，人類的大家庭唯有相互依賴和責任共享，藉由全球的團結與合作才能延續真正的和平（Francis, 2020）。2018年的全球社會工作倫理原則也強力推舉關係性的原則（principle of relatedness），強調人不是自由主義所主

張的自主性與獨立性個體，而是鑲嵌在社會當中，依賴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習俗而生活（IASSW & IFSW, 2018）。長期以來，社會工作實務中重視案主的自主性，期待案主擺脫福利依賴而能自給自足，社工和案主之間也要保持專業界線等議題都值得再深思。我們沒有要主張揚棄這些自由主義的概念，但不該讓這些主張成為社工實務的主流價值，因為更貼切人性的脆弱性、依賴性或相互依賴才應該是社工實務的人性論基礎。

伍、結語：新型冠狀病毒的反思

經濟人的觀點與自由主義是影響社會工作理論與價值的主流人性論，近年來倫理學、社會科學、社會工作逐漸融入多元的人性論，認為動物性、社會性和理性都是人的本質。因此，人不僅是理性自主的經濟人，也可以是脆弱和依賴的「關懷之人」（*homo curans*），也同時是相互依賴和團結的「互惠之人」（*homo reciprocans*）。*Ubuntu*的理念及《*Fratelli Tutti*》的主張，讓我們反思在自由主義的價值之外，社會工作的價值還有另類的多元選擇。每一種倫理價值都有其社會文化脈絡，就如十九世紀社會工作專業的起源基本上是建立在自由主義的價值之上，有許多自由主義的價值至今仍是社會工作所尊崇的價值。可是當今個人主義與自我中

心主義盛行的時代，為社會帶來政治、經濟、文化等危機，為了挑戰這些危機，我們無須完全拋棄自由主義的價值，而是需要試圖理解和接納時代新興或復甦的價值理念。所幸越來越多的社會工作學者有所反省，重新思考社會工作倫理除了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的效益論和義務論之外，社會工作者應該也要融入德行論和關懷倫理學的觀點（Gray & Webb, 2010; Hugman, Pawar, Anscombe, & Wheeler, 2021; Pease, Vreugdenhil, & Stanford, 2017）。從人類不可避免的脆弱本質，讓我們看到彼此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誠如法國哲學家 Emmanuel Levinas（1906-1995）所主張，我們從他者的脆弱性看到我們的責任，因此我們對他者是有責任的。本文僅就 *Ubuntu* 及《*Fratelli Tutti*》的觀點，從脆弱性與相互依賴對照理性自主來反思社會工作的價值。若以此做出發點繼續衍伸，愛與慈悲（*love and compassion*）、相互關係（*reciprocity*）、團結與友誼（*friendship*）等概念，都足以讓我持續省思當今主流的社會工作價值。

最後，想以脆弱性與相互依賴關係反思目前大家所關切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隨著疫情的嚴峻程度加劇，相信大家更能體會人類普遍的脆弱性，否則不會絕大多數人自動戴上口罩，也不會政府沒有宣布要封城，大都會區就形同空城一般。因為大多數人都體察到可能被染疫的脆弱性，

甚至染疫的脆弱性不分社經地位、年齡、性別。原本認為社經地位較高，經常在國際與國內流動的人感染機會較高，但沒想到社區感染擴大初期確有大部分是來自社經地位較弱的區域。而且不少自社區被感染者是相當無辜的，因為他們並沒有明顯做出不負責任的行為，甚至有助人者因而被感染。面對這種脆弱性，我們應該更謙卑的面對他人，因為多數的脆弱不是個人所能主宰。也因為COVID-19的全球擴散，更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緊密關係，以及人際之間彼此的責任，「戴口罩是保護自己也是保護別人」這句話就相當傳神。歷史事件總是很好的殷鑑，就要看具有主

體性的人類有無反省的意願。COVID-19確實呈現了人類軀體的脆弱性，但也提醒我們相互依賴的責任，就怕疫情穩定之後又回歸單面向的經濟人作風，像是疫情嚴峻期間醫生請長假而覺得這是「個人權利」的想法。疫情沒有消失之前，為了他人與自己，我們一定要保持社交距離。一旦疫情化解，我們便要重新努力縮短社交距離，唯有兄弟姊妹般的情誼才能讓社會更加平和。

（本文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Ubuntu、脆弱性、相互依賴

📖 參考文獻

- 教宗方濟各（2020）〈《眾位弟兄》通諭〉。檢索自http://www.vatican.va/content/dam/francesco/pdf/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201003_enciclica-fratelli-tutti_zh_tw.pdf。2021/3/15 作者讀取。
- Fineman, M. A. (2008). The vulnerable subject: Anchoring equality on the human condition. *Emory Law Journal*, 20(1), 1-23.
- Gade, C. B. N. (2011).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written discourses on ubuntu.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0(3), 303-329.
- Gade, C. B. N. (2012). What is ubuntu?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mong South Africans of African descent.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1, 484-503. doi: 10.1080/02580136.2012.10751789
- Gouws, A., & M. van Zyl (2015). Towards a feminist ethics of ubuntu: Bridging rights and ubuntu. In Engster, D. and Hamington M. (Eds.). *Care ethics & political theory* (pp. 165-18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y, M., & Webb, S. A. (Eds.) (2010). *Ethics and value perspectives in social work*.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ian.

- Hoffmaster, B. (2006). What does vulnerability mean? *Hasting Center Report*, 36(2), 38-45.
- Houston, S. (2010). Beyond *homo economicus*: Recognition, self-realization and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0(3), 841-857.
- Hugman, Pawar, R., Anscombe, M., A. W., & Wheeler, A. (2021). *Virtue ethic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IASSW] an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IFSW](2018). *Global Social Work Statement of Ethical Principl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assw-aiets.org/2018/04/18/global-social-work-statement-of-ethical-principles-iassw/>
- Juliha, L., Raitakari, S., & Löfstrand, C. H. (2017). Responsibilisation in governmentality literature. In Juliha, L., Raitakari, S., & Hall, C. (Eds.). *Responsibilisation at the margins of welfare services* (pp. 11-34). New York: Routledge.
- Kittay, E. F. (2015). A theory of justice as fair terms of social life given our inevitable dependency and our inextricable interdependency. In Engster D., & Hamington M. (Eds.). *Care ethics & political theory* (pp. 51-7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uch, H. (2016). Real utopias, reciprocity and concern for others.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42(9), 897-919. doi:10.1177/0191453715622520
- Kurevakwesu, W., & Maushe, F. (2020). Towards Afrocentric social work: plotting a new path for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frica through ubuntu. *Afric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0(1), 30-35.
- Mackenzie, C. (2014). The importance of relational autonomy and capabilities for an ethics of vulnerability. In Mackenzie, C., Rogers W., & Dodds, S. (Eds.). *Vulnerability: New essays in ethics and feminist philosophy* (pp. 34-5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kenzie, C., Rogers W., & Dodds, S. (2014). Introduction: What is vulnerability, and why does it matter for moral theory? In Mackenzie, C., Rogers, W., & Dodds S. (Eds.). *Vulnerability: New essays in ethics and feminist philosophy* (pp. 1-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gumbate, J. and Chereni, A. (2019). Using African ubuntu theory in social work with children in Zimbabwe. *Afric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9(1), 27-34.
- Mupedziswa, R., Rankopo M., & Mwansa, L. K. (2019). Ubuntu as a pan-African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for social work in Africa. In Twikirize, J. M. and Spitzer, H. (Eds.).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Africa* (pp. 21-38). Kampala, Uganda: Fountain Publishers.
- Nussbaum, M. C. (2013). *Political emotion: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pa Francis (2020). *Fratelli Tutti*. Rome: Vatican. Retrieved 15, March, 2021, from http://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201003_encyclica-fratelli-tutti.pdf

- Pease, B., Vreugdenhil, A., & Stanford, S. (2017). *Critical ethics of care in social work: Transforming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caring*. London: Routledge.
-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ger, W. (2014). Vulnerability and bioethics. In Mackenzie, C., Rogers, W., & Dodds S. (Eds.). *Vulnerability: New essays in ethics and feminist philosophy* (pp. 60-8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wpaul, V., & Henrickson, M. (2019). The (r) evolution and decolonization of social work ethics: The Global Social Work Statement of Ethical Principles.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62(6), 1469-1481.
- Swanson, D. M. (2007). Ubuntu: An African contribution to (re) search for/with a 'humble togethernes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ducation*, 2(2), 53-67.
- Tronto, J. C. (1993).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New York: Routledge.
- Tronto, J. C. (2013). *Caring democracy: Markets, equality and jus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Tronto, J. (2017). There is an alternative: *Homines curans* and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e and Caring*, 1(1), 27-43.
- Tutu, D. (1999). *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 London: Rider.
- Urban, O., & Ward, L. (2020). *Care ethics,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 van Breda, A. D. (2019). Developing the notion of Ubuntu as African theory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Maatskaplike Werk*, 55(4), 439-450.
- Wilkinson, R., & Pickett, K. (2009).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